

中国犹太拉比：跨文化研究的新命题

刘一辰

(深圳大学 师范学院 对外汉语系讲师)

【摘要】近年来，在中国开封犹太后裔中出现了一些尝试恢复犹太身份和犹太宗教的现象，甚至有人力图成为“中国犹太拉比”。本文探讨了这一现象出现的背景、原因，认为这一现象的产生，是其主观文化情感和客观现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未来发展走势目前尚难以确定，但它为学界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跨文化研究新命题。

【关键词】中国犹太拉比；跨文化；新命题

近年来，在原中国开封犹太人后裔中出现了一些试图恢复犹太宗教和犹太身份的现象，有年轻的开封犹太人后裔，努力学习犹太传统，包括希伯来语言、犹太教义、犹太习俗等等，甚至力图成为“中国犹太拉比”^①。这一现象虽然是个别的，但从中国开封犹太人问题及其研究的历史背景，从全球化条件下跨文化研究的视野来看，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新命题。

一. 背景回顾：开封犹太人的同化

古代开封曾经存在着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同时持续时间也最长

的犹太社团。犹太人来到开封的时间，到来的原因，及其之后在开封当地渐渐被同化的历程，一直是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的跨文化研究重要命题。

在中国开封犹太人的研究中，争议性最大的或许就是犹太人的来华时间。在当今学术界，分别有周代说、汉代说、唐代说、北宋说等多种不同界说，甚至开封犹太会堂自己建立的三块关于重修会堂的石碑上，对于犹太人进入中国的时间，也是说法不一。明弘治碑（1489年）的说法为宋代，明正德碑（1512年）的说法为汉代，而清康熙碑（1663年）的说法则是周代。^②对于犹太人是何时到达开封，学术界的说法则多倾向于北宋说。

在今天，我们或许很难想象，是什么原因促使大批的犹太人，背井离乡，远赴遥远的中国。在敦煌的千佛洞中，曾发现犹太教祈祷文的残片，上面则表明了犹太人主要是通过陆路来到的中国，而他们最有可能的身份是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犹太商人。或许在最初，犹太人只是想打开中国这一东方的神秘大国的贸易之门，却没有想到，中国包容的政治文化氛围，让习惯迁移的犹太人定居了下来，也更加没有想到犹太民族会在这里被大范围地同化。

犹太民族是一个历经各种苦难，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民族，但他们的民族意识及独特的犹太特征，使他们在世界各地存活了下来。因此，开封犹太人的同化，在犹太人的流浪历程中，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对于开封犹太人的同化的原因，较为被

认可的几种说法分别有“通婚说”、“宽容说”、“可能性的反犹说”、“中犹文化相近说”等等。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主要是以下两点因素，造成了开封犹太人的同化：1. 开封犹太人平等地参与了中国的科举考试竞争公职；2. 与当地人的通婚。当时的经济情况对犹太人的同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犹太人在当时的社会中由于生存所需，对当地人必须产生依赖，从而带来语言、文化、生产方式上的改变。^③不管开封犹太人同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可否认的是时至今日，今天的开封犹太后裔们，不论是体貌特征，还是语言文化和生活习俗，都已经基本没有了犹太特征。可以说，“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群体，经数百年同化演变，在中国开封已经不再存在。

二. 最新现象：制造中的中国犹太拉比

然而，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二三十年的历史节点，在原开封犹太人后裔中，也有日渐增多的开封犹太后裔，开始渴望了解自己的祖先，了解犹太民族的历史文化，甚至有年轻的开封犹太后裔立志成为中国犹太拉比。在犹太人社团中，拉比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拉比（Rabbi）本意为老师，指的是接受过正规的犹太教育，学习过犹太教经典，在犹太人社团或者犹太教会担任精神领袖的人。也可以说，拉比就是犹太教的职业神职人员。目前中国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古代开封犹太人中，第一个开封犹太会堂是在1163年建立的，也就是说，犹太拉比从那时起就正规地存在于中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

中，开封犹太会堂经历数次整修重建，拉比的人选也数次更迭。拉比身份的取得，需要由另一名拉比的正式任命而来。然而在 1850 年，开封的犹太社团的最后一名拉比去世，却没有人来接替他的位置。随着犹太人渐渐的同化，这一曾经在开封犹太社团中重要的职位，慢慢地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然而近年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开封犹太后裔对自己祖先的知识的了解，在其后裔中有出现了一些试图恢复犹太身份和犹太宗教的迹象。王雅各 (Yaakov Wang) 是一名开封犹太后裔，在 2009 年 10 月，他和六名与他年龄相仿的开封犹太后裔，一起在耶路撒冷的犹太神学院，系统地学习犹太教义及犹太法律。一旦实现了信仰转变，王雅各便打算学习继任犹太拉比所需要掌握的知识。作为一名中国开封犹太人的后代，他现在的梦想是可以成为近两百年来，中国第一个新的犹太拉比。王雅各认为，成为第一个中国本土犹太拉比后，他身上肩负的责任感和使命，远远大于职位本身所带来的荣耀。^④

那么，为什么在王雅各这一代年轻的开封犹太后裔的身上，会产生成为犹太拉比的想法？

其原因和条件首先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情感，以及作为开封犹太后裔的“寻根”的意识。从犹太民族的历史来看，他们很早就拥有成文的完整的教义经典，有系统的神学信仰体系和民族文化，所以即使云游四海，他们的民族特征、精神纽带和生活习俗也不会轻易消失。对于开封犹太人来说，尽管在同化的过程中，其民族特征从总体

上得到破坏，但在生活的某些方面，仍保留着一些犹太传统的痕迹，并且也得以传承了下来。王雅各在回忆自己在开封的生活时说，在朋友聚餐时，他是唯一一个不吃猪肉的人，而这一细微的差别，既是他的犹太祖先遗留下的习俗，也是对他独特身份意识和身份感的一种暗示和提醒。而恰恰是这种身份意识，使得今天像王雅各这样的年轻的开封犹太后裔和他们的祖先和关于祖先的记忆，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文化情感得到逐渐地培植，因而近年来开封犹太后裔们产生了寻找民族之根的文化冲动。

除去开封犹太后裔对故土的寻根情结，科技发展所提供的现代信息化交际平台为开封犹太后裔们了解故土，了解世界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与以往闭塞的生存环境不同，随着互联网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开封犹太后裔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资料的检索查询，便可以轻易了解到世界各地犹太后裔的发展变迁，这无疑也进一步触动了他们的寻根意识，并且也可以让他们便利地与相关犹太人组织取得联系。

“回归以色列”组织在促使王雅各和他的同伴们走上成为中国犹太拉比之路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回归以色列（Shavei Israel）是由美籍犹太人弗朗（Michael Freund）所创办的一个致力于帮助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归自己的故乡，回归自己的文化，回归自己的传统的组织。^⑤ Shavei 在希伯来语中的本意是“回归”的意思，“回归以色列”组织通过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散落各地的犹太人后代，并且为有需求的犹太人后代提供帮助，协助他们寻求建立

与以色列及犹太团体的联系。在创立的十多年期间，“回归以色列”已经成功地帮助数千名的犹太后裔从世界各地回归到以色列，王雅各等开封犹太后裔，就是在该组织的帮助下，得以远赴以色列、学习犹太文化知识并立志要成为中国犹太拉比的。

然而，开封犹太后裔的“回归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便出现了开封犹太人后裔尝试移民以色列的现象。一位姓金的开封犹太人后裔和他的家人经历了繁琐、辗转的历程，才得以回到以色列。金先生曾多次上访北京，包括向以色列驻华机构提出申请，企图恢复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均以失败告终。1999年，金先生一家借故到芬兰旅游，由于得到芬兰犹太组织的帮助，才最终从芬兰转道移民以色列。相比起金先生的经历，王雅各等犹太后裔显然是幸运的，除了强烈的精神渴望，恰好的现实契机也是他们得以回归的必要条件。

王雅各或许可以成为第一个中国犹太拉比，但他却不是第一个得到“回归以色列”组织帮助的开封犹太后裔。早在2006年，时年21岁的开封犹太人后裔金金，便来到以色列，在希伯来大学进行本科学习。^⑥完成对于她来说是非常艰难并且具有挑战性的、信仰转换前需要的学习。2009年，她出现在迎接王雅各一行人的队伍中，欢迎其他同胞来到以色列。当地电视台在机场进行了现场采访，“回归以色列”的创始人弗朗表示，正是在开封犹太后裔和其组织共同的不懈努力下，开封犹太人得以持续的回归。同时他也希望有更多的开封犹太人可以回归以色列。金金和王雅各，作为年轻的犹太后裔们的代表，

他们的事例可能鼓励更多的开封犹太人踏上回归之路。

三. 关于“中国犹太拉比现象”的文化思考

王雅各代表的“中国犹太拉比现象”，以及开封犹太人后裔试图恢复犹太人身份的种种努力，引发了诸多理论和现实的问题与挑战。

首先，从跨文化理论的角度而言，开封犹太后裔想要成为犹太拉比的心理渴望无疑是一种对祖先传统所产生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指的是个人对一个特殊文化或者族群所产生的归属感，一般可以分为未审的文化认同期（unexamined cultural identity）、搜索期（cultural identity search）及完成期（cultural identity achievement）三个阶段。^⑦作为已经被汉化了了的开封犹太后裔，王雅各等开封犹太人后裔起初对犹太教、犹太文化和犹太传统的懵懂追求，实际上则处于对于犹太传统的未审文化认同期——在开封犹太人后裔中处于这一未审文化认同期的可以说并不止于王雅各等几位年轻人。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相关文化个体处于不同异质文化的混合作用，文化个体所产生的对传统文化本体的认同较为表浅，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来到以色列后学习和研究犹太教知识和犹太传统的过程可以看作是王雅各等开封犹太人后裔对犹太文化的搜索期，搜索期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甚至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王雅各等开封犹太人后裔原本负载的汉文化传统将与他们所渴望归依的犹太文化发生复杂的文化接触（cultural contact），这一接触将既可能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异质文化的融合，也有可能包含着异质文化间的文化冲突

(cultural conflict), 其结果如何尚待观察。只有在经过前述两个未审的文化认同期和搜索期之后, 王雅各等人才能到达最终的文化认同的完成期, 从而获得他们所渴望的对犹太传统的完整的文化认同。值得强调的是, 具体的文化实践远比理论的分析来得复杂、多变、艰难和不确定。在文化认同的过程中, 对于像王雅各这些跨文化的“边界人”来说, 认同的危机随时可能出现, 他们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中国式的教育, 他们身上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的烙印, 中国传统和犹太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对其身份的困扰和迷失, 将是一种十分可能的趋向。所以目前很难预计他们能否克服这种心理上的认同危机, 能否良好地掌控和协调两种不同文化所带来的碰撞和磨合。

其次, 从犹太人的流散历史来看, 成为中国犹太拉比的愿望和恢复犹太人身份的追求, 是作为流散的犹太人后裔对其遥远的犹太民族意识的一种唤醒。犹太人在漫长的流散过程中散居在世界各地, 无时不承受着与异质文化的接触和异质文化的冲击, 有的出现一定的身份融合、身份变移, 有的甚至被同化。在这种文化处境中, 流散中的犹太人在其内心深处潜藏着难以泯灭的民族记忆, 而这种记忆也一代代地流传下去, 这才使得虽然犹太人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流散, 也发生过各种各样的文化变迁和文化变移, 但从整体上看, 犹太传统并未断裂, 更未消失。王雅各曾表示, 成为犹太拉比, 为的是帮助更多的开封犹太后裔得到关于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知识, 他同时强调说, 这也是他们祖先希望看到的。^⑧由此可以看出, 即使开封犹太人的同化已

经成为公认的事实，但其犹太民族的遥远记忆，一旦遇到适宜的环境，仍然可以被激发唤醒。王雅各说过：“我的爷爷是犹太人。早在我小时候，他就经常告诉我一些犹太的事情，并且让我记住自己的犹太身份。”很多开封犹太后裔就像王雅各一样秉承了自己父辈、祖辈的愿望，还顽强地保持着一定的犹太习俗。在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不同的文化的接触交流越来越多，开封犹太人后裔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其先祖传统。加之有“回归以色列”这样的组织的实际推动，使得开封犹太后裔有了系统学习犹太知识和犹太教传统的机会，并使他们有了成为“中国犹太拉比”的可能。尽管如此，在今天我们仍然很难断定王雅各所代表的开封犹太人后裔对犹太传统的回归和追求究竟是普遍的、集体性的，还是个别行为，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近年来，社会上和学术界给予开封犹太后裔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中外学者、媒体也曾多次在开封当地对犹太后裔进行了探访。多数受访的开封犹太后裔均表示，在父辈的影响灌输下，还是明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规限，想要回复犹太身份，依然是非常困难的。能够像王雅各及其同伴一样可以回归以色列学习生活的开封犹太人后裔毕竟只占少数，而他们的回归也仅仅是踏上归程的起点，想要成为犹太拉比及完成犹太人身份的转化，还是需要面对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再者，从多年来的社会存在及具体的操作实施上来看，开封犹太人后裔对犹太身份的重新再造能否成功并得到社会的认可也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尤其在现实的操作层面上，还面临着不少法律、

社会管理、民族关系甚至政治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和困难。新中国成立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虽然开封犹太后裔中的一部分人竭力保存着一些犹太习俗，并极力捍卫和争取“犹太族”的身份，但官方政府并不认定其为少数民族，如果要中国官方改变这种认定，将会遇到重重困难，因为在该问题的背后将会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等方面的连锁问题。这是中国政府高层数十年前既定的方针。所以在开封虽然曾经出现过犹太后裔去政府公证处要求进行“犹太”身份公证的情况，但是官方的态度肯定是令其失望的。政府的这一政策很难有所改变。

不仅中国官方的政策将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障碍，以色列官方方面的相关法律、政策也很不乐观，很难把开封犹太人后裔划分为“犹太人”。犹太人传统上一般按其母系的谱系渊源界定身份，根据以色列《回归法》的规定，只有自己自愿加入犹太教完成了信仰转变和母亲是犹太人的人，才是犹太人。然而开封犹太后裔是由父系相传，长期以来他们也失去了严格意义上的犹太社团的依托及其宗教信仰，所以在以色列方面而言，开封犹太后裔的“犹太人”身份也难以轻易获得法律和政策的认同。在北京开办犹太人中心的拉比希蒙·弗罗因德利希认为，尽管历史上在开封的确存在过犹太族群，但后来的“开封犹太人”也只能算是有一定犹太渊源的犹太人后裔，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犹太人，以色列官方也从来没有给任何开封犹太后裔发放过移民签证。

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出现，都可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潜存着一定的世俗功利因素，或者与一定的世俗功利因素相伴生。近几

十年来，跨国移民是一个显著的世界性现象，这一国际背景不能忽视。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部、国际移民组织等的有关统计，到2005年时在国外居住时间1年以上的全球移民总人数已接近2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3%，目前全世界大约每35个人中就有1个是移民，其中来自中国的移民约3500万，超过国际移民总人数的18%，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发生的。从移民学的角度而言，移民的原因多种多样，但追求更好生活的经济因素是主要原因，追求更好的人文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如果将开封犹太人后裔回归以色列的特定现象置于这一不能忽视的世界背景之下来审视，无疑增加了理论和现实的复杂性。当然我们无法清晰断定包括开封犹太后裔在内的世界各地犹太后裔回归以色列的内在促发力（**instrumental imperatives**）的全部组成和具体情形，但各种精神文化要素与一定的世俗功利因素的混合不是没有可能的。

开封犹太后裔对以色列的回归，以及王雅各等人对成为“中国犹太拉比”的渴望，是当代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正在进行中的一个极具“样本意义”的跨文化现象，目前作出任何理论上的结论都还为时尚早，但这一命题的内涵指向却十分清晰和值得重视：一个于宋代以前（或许早在汉代就已发生）迁徙来到中国的犹太族群，在与中国社会进行了长期和深度的融合（包括婚姻血缘和文化习俗等方面），并已基本丧失了其民族宗教和文化特性之后，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其中隐在的某些文化情感得到了“激活”，那么她是否还有可能重新恢复其悠远和飘渺的民族特性？犹太人曾创造了把死去两千

多年的希伯来语复活的这一人类语言史上的奇迹，那么开封犹太后裔能否创造在断绝其宗教生活数百年甚至远离其文化故土两千余年之后，重新恢复民族特性的奇迹？在开封犹太人后裔的这种努力中，其文化情愫是如何与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相交融和相互作用的？现行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和体系对这一现象将如何发生作用，其可预知的前景如何？这一现象的背后隐含和折射了诸多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际的尖锐问题，既是崭新的有样本意义的，更是富有挑战性的，值得深入关注研究。

【注释】

- ① Michael, F., "From Kaifeng to the Kotel", *Asian Jewish Life*, vol.7 (2011), p. 5.
- ② 刘洪一：《犹太文化要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4月版，第135页。
- ③ 参见沙博里主编：《中国古代犹太人：中国学者研究文集点评》，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177页。
- ④ 参见 Michael, F., "From Kaifeng to the Kotel".
- ⑤ 参见 Michael, F., "From Kaifeng to the Kotel".
- ⑥ Anshel, P., "Taking the Silk Route Back Home", Retrieved October, 2012, From <http://www.haaretz.com/taking-the-silk-route-back-home-1.247783>
- ⑦ 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版，第171页。
- ⑧ 参见 Michael, F., "From Kaifeng to the Kotel".

【参考文献】

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版。

刘洪一：《犹太文化要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4月版。

沙博里主编：《中国古代犹太人：中国学者研究文集点评》，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

Anshel, P., "Taking the Silk Route Back Home", Retrieved October, 2012, From
<http://www.haaretz.com/taking-the-silk-route-back-home-1.247783>

Michael, F., "From Kaifeng to the Kotel", *Asian Jewish Life*, vol.7 (2011).

通讯地址:

刘一辰, 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对外汉语系

电子信箱:

Liuyichen0327@163.com

电话:

13824398687